



都市空间与文化风貌【三篇】

【主持人语】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滋生地。任何一座城市的建立都不仅是外形的建造与财富的聚集,而且也是历史的积淀与文化的结晶,因此城市既有着个性鲜明的物质形式,也有着内涵深邃的文化风貌。刘易斯·芒福德在其经典名著《城市发展史》中说得好:“城市不止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如果说在过去许多世代里,一些名都大邑,如巴比伦、雅典、巴格达、北京、巴黎和伦敦,都曾经成功地主导过他们各自国家民族历史的话,那首先是因为这些大都城都始终能够成功地代表各自的民族历史文化,并将其绝大部分留传给后世。”可见,决定一个城市品格和地位的绝不仅仅是规模的大小和居民数量的多少,它更和精神内涵及文化风貌息息相关。事实上,一个城市的文化风貌往往就潜藏在它的都市空间之中。本期“学子语类”我们即刊发了一组有关“都市空间与文化风貌”的专题论文:孙逊的《“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一文,对“海派文化”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成因进行了探讨;徐宝余的《晋室南迁与江南都市文化品格的塑造》一文,考察了晋室南迁影响江南都市文化品格的方方面面;查清华的《唐诗中江南商人与商人妇的抒写》一文,则具体分析了唐诗对江南商人与商人妇这一特定人物群体的抒写。

“海派文化”:近代中国 都市文化的先行者

■ 孙 逊

“海派文化”为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最具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具有趋时求新、多元包容、商业意识和市民趣味四个主要特点,而形成这些特点的历史成因,主要在于上海作为商业都会、移民城市和租界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从本质上讲,“海派文化”是近代中国都市

文化的集中反映和典型表现。

【关键词】“海派文化”;历史成因;都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10-0007-06

孙 逊(1944—),男,上海高校都市文化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都市文化、古代文学研究。(上海200234)

本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建设项目(编号:S304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海派文化”是最为另类的一支。这是因为“海派文化”是中国地

域文化中融入异质文化最多的一种文化形态。这种异质文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欧风美雨而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二是因商业都会而盛行的商业文化,前者和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有着质的区别,后者和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大异其趣,因而使近代上海文化形成了和古代迥然不同的驳杂多彩的特点,这种具有异质特点的近代上海文化我们通常便称为“海派文化”。本文拟就“海派文化”的主要特点及其历史成因作一粗线的探讨。

一、“海派文化”的主要特点

“海派文化”作为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概念,最早发端于绘画和戏剧两种艺术形式。1937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指出:“同治、光绪之间,时局益坏,画风日漓。画家多蛰居上海,卖画自给,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画品遂不免流于俗浊,或柔媚华丽,或剑拔弩张,渐有‘海派’之目。”^{[1](P196)}而晚清时期的京剧界,则以北京为中心,“呼外省之剧曰‘海派’”,“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非专指上海也。”^{[2](P5027)}这庶几就是“海派”一词的由来。前者特指上海地区,后者则泛指北京以外的“外省”。从以上引文不难看出,“海派”之目是一个多少带有贬义的称谓。但透过这些带有贬义的称谓,我们不难窥见“海派文化”的诸多特点。

(一) 趋时求新:“海派文化”的特点之一

近代上海因其特殊的地位和条件,往往在很多方面成为全国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者;大至社会风尚,小至日常生活,包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学术研究、文化艺术、饮食起居、服饰装扮、娱乐游戏、风俗习惯,“海派文化”都表现了敢于破除陈规旧俗、勇于更新创新和喜欢标新立异的特点。

自开埠以后,国内各种新型文化事业和产业大多发轫于上海。如晚清报业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份近代新闻报纸英文《北华捷报》、第一

份中文新闻期刊《六合丛谈》、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都诞生于上海。不只是报业,其他如中国第一座博物馆——1868年由传教士创办的徐家汇博物院、第一所新式学堂——1849年由传教士创办的徐汇公学、第一所使用新型印刷技术的出版机构——1843年也是由传教士创办的墨海书馆以及诸如第一座新式剧场、第一座舞厅、第一所女校、第一家电影院、第一家广播电台、第一盏电灯、第一辆汽车和电车……凡此等等,都无不首先诞生于上海。总之,举凡戏曲改革、新闻报刊、话剧电影、印刷出版、西洋音乐和美术、新式学堂和医院以及各种公共文化设施,上海或是最早的发祥地,或是主要的集散地。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海派文化”有着敢为天下先的特点。

我们不妨再以作为海派文化发端的海派绘画和戏剧为例:晚清一代的海派画家不重复前人,不囿于法度,画风清新华丽,着意于新的时代、新的气韵,对传统的中国画是一次全面的革新;海派京剧则“以唱做力投时好,节外生枝,度越规矩,为京派所非笑”^{[2](P5027)};这里,海派绘画的不重复前人、不囿于法度和海派京剧的“节外生枝,度越规矩”,正和“海派文化”趋时求新的特点相表里。

我们还可以文化娱乐和日常生活用品为例:近代上海文化娱乐除传统戏曲、曲艺、杂耍外,更流行马戏、影戏、跑狗、赛马、跳舞等新型时尚娱乐,这些时尚娱乐或“令人目不及瞬,口不能状”^{[3](P34)},或“倏忽变幻,不能备述”^{[3](P35)},或“骇人心目”、“恍疑身历其境”^{[3](P9)},吸引了上海广大市民的眼球,所谓“观者上自大夫,下及负贩,肩摩踵接,后至者几无立足处。至于油壁香车、侍儿娇倚者,则皆南朝金粉、北里胭脂也,鬢影衣香,令人真个销魂矣。”^{[3](P20)}还有日常生活用品,上海市民是最先享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群体,从煤气灯到电灯,从电报到电话,从自来水到现代卫生设备,各种“外洋货物”,“麟萃于

斯,光怪陆离,奇技淫巧,非不赏心悦目,居民争购用之。”^{[4](P100)}近代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亚洲时尚之都,正是因为“海派文化”趋时求新的特点已经渗透到这座城市的骨髓和肌理。正如成书于民初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在评论上海人的“趋时”特点时所说:“上海人最喜用‘新’字,无论何种……若冠一‘新’字于其上,遂觉件件皆新,一新而无不新。”^{[5](P213)}

(二)多元包容:“海派文化”的特点之二

今天,人们对“海派文化”可能有这样那样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即“海派文化”具有多元包容的特点。早期海派戏剧所谓“泛滥无范围之谓”,也是类似意思的贬义表达。

上海开埠以后,迅速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最大通商口岸,伴随着商贸的频繁往来,文化也随之进进出出,相继登岸。包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在内的西方文明的进入,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洋气的城市;内地大量移民的迁入,则把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各个区域文化带进了上海,于是上海成为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汇、交流与交融地。这种交汇、交流和交融使“海派文化”犹如千条江河汇入大海,它们相激相荡、相克相生,赋予“海派文化”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点。

即以表演艺术为例,作为国剧的京剧的兴盛虽以四大徽班进京为标志,但京剧的定名却是在上海。乾嘉年间,进京的徽班为了演出剧目和技艺的丰富,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创造了一种新的剧种,在咸同年间基本成形。由于其唱腔以徽班主基调二黄和汉调的西皮为主,所以被称为“皮黄戏。”不久,徽班和北方京剧艺人南下上海演出,其剧目和唱腔、文字令人耳目一新,一时观看“皮黄戏”成为时尚,所谓“上海初不知二黄调,今则市井儿童信口成腔,风气移人,一至于此。”光绪二年(1876)二月七日(3月2日),上海《申报》发表《图绘伶伦》一文,文中首次提出“京剧”这个名称,所谓“京剧最重老生,

各部必有能唱之老生一二人始能成班,俗呼为台柱子。”这是最早把“皮黄戏”称作“京剧”的书面文字。从此,京剧作为中国戏曲的代表流传于大江南北,其中,“京剧”在上海的定名可视作上海对京剧艺术发展的重大贡献。至于其间海派京剧对于传统程式的改造,对于舞台艺术效果的追求,乃至对于西洋音乐的和声原理和多声部演唱法则的借鉴,更典型地体现了上海文化多元包容的特点。不仅京剧,许多地方戏曲和曲艺,如苏剧、甬剧、评弹、越剧、扬剧、锡剧等,都是在上海形成或获得长足发展的,个中原因,不能不说和“海派文化”的上述特点有密切关系。

再以服饰、饮食和习俗为例:上海人衣着时尚,追求新奇,中装旗袍和西装革履竞美,引领国内时装潮流;饮食上讲究品质,融合中餐和西餐、本邦菜和外地菜精华,不断推出新品。风俗也是如此,光绪、宣统之交,在上海这座商业都会里,既盛行文明婚礼,有诸如证婚、主婚、致辞、筵宴等仪式,又有传统的婚礼,有诸如放定、纳彩、迎娶、拜堂等仪式;丧仪既有传统的哭丧、守孝等旧礼,又有追悼会、默哀等新仪式;凡此都典型地体现了“海派文化”中外杂陈、新老交替的时代特征。

(三)商业意识:“海派文化”的特点之三

上海是座通商口岸和商业都会,在商言商,商业意识深深浸染着文化的各个方面。早期海派绘画所谓“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数语道破了其商业性特点。其实不独绘画如此,上海作为一座“文化码头”,举凡文化的方方面面,画画的、演戏的、唱歌的、跳舞的、写作的、说书的、展览的、杂耍的等,无不是把文化作为一种商业行为来策划运作,因而使“海派文化”深深烙上了商业的印记。鲁迅有关京派“近官”、海派“近商”的论述^{[6](P352)},可谓一言中的地揭示了“海派文化”的商业特性。

我们不妨以小说创作和出版发行为例:在古代,小说创作和刊刻大都是作者个人行为,虽

不一定是为藏之名山,但也不以营利为目的;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早期商品经济的活跃,书坊主的介入使小说创作和刊刻有了明确的商业意识和动机,但此时尚未形成正式的机制。近代以降,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报纸副刊和文艺期刊多以小说招徕读者,它以稿酬为润滑剂,在编辑——作者——出版者——读者之间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商业运作机制:报刊和编辑根据社会和需求向作者征稿或约稿,作者按照报刊和编辑的要求进行写作和创作,出版者依据事先的承诺和约定付给稿酬,读者通过购买和订阅为报刊创造利润,同时也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这是一套互动和多赢的机制,它使小说带有了商品的性质。而这套机制中两个最重要的环节:向社会公开征求小说和承诺稿酬,都发生在上海。1877年10月17日,《申报》首次刊登“有图求说”广告,为“精细画图十幅”征求编成一部“约五万字”小说,并承诺“文理尤佳者”“送润笔洋二十元”;1878年3月7日,《申报》刊《菟书》启示,“愿出价购稿,代为排印;抑或俟装订好后,送书数十百部,以申酬谢之意”;1884年6月4日,《申报》为《点石斋画报》征稿,承诺入选者“每幅酬笔资洋两元”;1895年5月25日,《申报》刊登“求著时新小说启”,承诺按不同名次酬洋五十元至八元不等;其后,小说正文活动不断,1902年《新小说》社的小说征文,190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小说征文,1906—1908年《月月小说》社的小说征文,1907年《小说林》社的小说征文,1909年改良小说社的小说征文,1911年《小说月报》的小说征文,多数都明码标价,分不同等第,以每千字×元计算稿酬。至此,稿酬制度从书稿开始,扩展到报刊来稿;报刊稿酬从绘画开始,扩展到小说及其他报刊文字;上海作为一座商业都会,它率先把原来为个人目的写作的文化产品转化为商品,使之成为市场服务,满足市场的需求,从而在使创作活动商品化的同时,也使报刊增强了市场竞争

力。商业意识对“海派文化”的浸淫,由此可见一斑。

(四)市民趣味:“海派文化”的特点之四

除去上述趋时求新、多元包容、商业意识等特点之外,市民趣味是近代“海派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早期海上画派所谓“稍投时好”,“画品遂不免流于俗浊,或柔媚华丽,或剑拔弩张”,以及海派京剧“以唱做力投时好,节外生枝,度域规矩”等,便是这一特点的贬义表述。

近代上海作为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其市民阶层构成了城市中数量最多的人口群体,而且这一群体的构成和传统市民阶层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中以买办和通事为代表的新式商人,从事金融、商业和实业投资的资本家,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诚实劳动者以及城市管理部门和公共机构的职员与知识分子,都是过去传统市民阶层所没有过的,他们既是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主体。以绘画和戏剧为发端,进而辐射至各种艺术形式的近代上海文化,自然要首先面对这一庞大的消费群体,迎合和适应他们的审美趣味,这样才有可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增强市场的竞争力。

所谓市民趣味,即指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但由于市民的构成本身就比较复杂,因而很难用一标杆尺来衡量,一般理解它包括诸如鲜艳、明快、华丽、通俗、乃至低俗以及雅俗共赏等审美特征。即以海上画派为例:以“三任”为代表的早期画家,其绘画题材多取自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历史故实、神话传说和民俗生活,大量使用谐音、暗喻等手法,以表现趋吉避凶、多子多福、加官晋爵、美色延年等主题,加上设色明丽、线条柔媚、造型生动、画面绚烂,既悦心目,又讨口彩,从而满足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画家也因此得以在经济上自立。

海派京剧也是如此,为吸引观众,特别要求突出情节的曲折生动和排场的漂亮热闹;为追求感官刺激,甚至以真刀真枪上台;虽也讲程

式,但更注重按照剧情的需要,灵活地驾驭程式;加上机关布景翻奇求新,舞台灯光变幻豪华,魔术特技花样迭出,一时深得上海人喜欢,形成了海派京剧通俗明丽的特点,这一特点正是京剧自觉适应市民审美趣味的结果。所以有论者谓:“京剧的推行,与其说是京津艺人的艺术精湛有以致之,不如说是上海艺人发展能力较强,营谋之心较切,因而随处找到它的立足点”;正是因为海派京剧能“适应当地(上海)民情风俗”而进行改革,所以它才能“以新颖之剧目,精进之唱段,华丽之服装,鲜明之伴奏而与当地剧种争长。”^{[7] (P432)}这里所总结的海派京剧的立足点和生命力,正在于它适应了上海的“民情风俗”亦即我们说的市民趣味。

二、“海派文化”的历史成因

以上是近代“海派文化”的四个主要特点,和其他区域文化相比,这些特点或是“海派文化”所独有的,或是其他区域文化虽然也有,但上海表现得最为典型充分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海派文化”的上述特点,是和其独特的历史条件与社会性质密切相关连的。具体来说,形成“海派文化”上述特点的历史成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 商业都会:“海派文化”的历史成因考察之一

如上所述,上海是近代最早对列强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这种通商开放,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通商航运,由于列强的进入,立刻把这些地区率先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从而使这些城市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

近代都市和历史上作为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的传统都市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突出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大量聚集,对外贸易和商业活动的高度集中以及产业经济、金融经济的蓬勃发展,它使上海仅用了10年时间,就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和经济中心。而经济活

动的繁盛,商贸、金融和产业经济的迅速崛起,使服务于它们的各种行业纷纷兴起,新兴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壮大,市民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态结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切,共同构成了近代上海的商业都会性质,而这种商业都会性质则从根本上决定了“海派文化”的上述诸多特点,其中包括趋时求新、商业意识、市民趣味等,都无不是和上海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和近代的商业都会联系在一起的。

(二) 移民城市:“海派文化”的历史成因考察之二

上海开埠以后,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人口大量涌入。1843年,上海开埠时,城市人口20多万,1900年超过100万,1910年约为130万,1915年超过200万,1930年超过300万,1947年超过400万,1949年初达到546万。短短一百年间,上海从一个普通县城一跃而为全国第一大都市。而在上海人口爆炸式增长中,75%以上是移民。根据上海自1885年以来历年的人口统计,公共租界非上海籍人口通常占80%以上,华界非上海籍人口通常占75%以上。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1月的统计,非上海籍人口占85%,上海籍人口仅占15%。^[8]可见,上海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移民城市。

上海的移民由国外和国内两部分组成,其中国外移民数量虽少,但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很广,加上他们的地位特殊,因而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国内移民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18个省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共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即太平天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分别使上海人口增加11万、78万和208万。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和国内五湖四海的移民来到上海,自然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也带进了上海,而且他们在上海站稳脚跟以后,更把保持和发扬其各自的文化作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大量移民的聚集也为各种文化的

生产和消费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因而上海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对形成“海派文化”诸如多元包容、趋时求新、市民趣味等特点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租界社会:“海派文化”的历史成因考察之三

上海除去为商业都会和移民城市,其另一个主要特质是租界社会。上海租界是旧中国租界中最大的一个,其规模、形式与发展变化都最具典型意义。租界的影响是多元复杂的,所谓“从政治上观之,则上海为外人侵占入手地;从物质上观之,则上海又为全国文明发轫地”^{[9](P1)},它既是耻辱的标志,又是文明的窗口;尤其是在市政建设和城市管理上,租界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广为世人所认可。

同时,租界又是“国中之国”,其范围之内有中国政府主权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因而它又成为中国封建政府和军阀统治下的一个权力薄弱点,从而为各种政治力量包括进步力量提供了某种“保护”和活动空间,形成了上海城市特有的波诡云谲的特点。所谓“以租界关系,为吾国普通政令所不及,遂藏有政局之黑幕及其背影。革命之起,诸伟人每利用上海一隅,以与中央政府相抗。迄乎武昌举义,江浙响应,而大本营实在上海租界,此其明证也。”^{[9](P40)}确实,戊戌变法以后保皇派和革命派在上海租界的活动,北洋军阀时期新文化运动在上海的发轫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国民党时期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的设立和左翼文化中心在上海的形成,都与租界的存在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上海租界的存在及其影响,对形成“海派文化”诸如多元包容、商业意识、趋时求新等特点同样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正如有识之士所感叹的:“租界一隅,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昔《洛阳名园记序》称天下之盛衰视洛阳,洛阳之盛衰视名园之兴废;吾于上海则亦曰:天下之治乱视上海,上海之治乱视租界,盖世变系焉矣。”^{[9](P60)}此

可谓深中肯綮之论。

以上我们从通商口岸、移民城市和租界社会等三个方面简要论述了近代“海派文化”特点得以形成的历史条件,这三方面条件中的两条——商业都会和移民城市,虽然在上海开埠之前已初见端倪,但在开埠以后才蔚为大观,加上开埠以后才形成的租界社会,这些历史条件应该说是近代上海所特有的,全国大多数省市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当然,和上海同时开放或者稍后开放的通商口岸还有好几座,它们也都程度不同地具备这些条件,但由于在口岸大小、移民数量与租界规模上都无法和上海相比,因而决定了上述文化特点也是近代上海所特有的,即使其他口岸城市也有,但远不如近代上海来得突出和典型。

三、结束语

“海派文化”所具备的上述特点,从根本上说,是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集中反映和典型表现,而决定这些特点的,是1840年以后开启的、以上海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都市的现代化进程。我们稍作回顾便不难发现,上述特点是传统文化较少具备或基本不具备的,例如,传统文化偏重因循守旧,“海派文化”喜好趋时求新;传统文化强调定于一尊,“海派文化”倡导多元包容;传统文化重农轻商,“海派文化”以商为本;传统文化追求士大夫意趣,“海派文化”迎合市民口味……“海派文化”不仅与传统文化大相异趣,而且明显烙有新的时代印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艺术的黄金时代,都有一个城市作为其背景与支撑,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与艺术活动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并且对于艺术的繁荣来说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10]在中国,如果我们要找一个代表近代文化艺术黄金时代的背景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就是上海以及由上海催生出来的“海派文化”。要而言之,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海派文化”独特的品格和特质,

这些品格和特质不仅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而且是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最具现代性的一支。

【参考文献】

- [1] 俞剑华. 中国绘画史(下册)[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 [2] 徐珂. 清稗类钞[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3] 葛元煦等. 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4] 胡祥翰等. 上海小志·上海乡土志·夷患备尝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5] 胡朴安. 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 [6] 鲁迅. 鲁迅全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 [7] 周贻白. 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8] 熊月之. 略论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J]. 学术月刊, 1997, (10).
- [9] 姚公鹤. 上海闲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10] 刘旭光. 文艺繁荣与城市文化之关系[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4).

【责任编辑: 龙迪勇】

晋室南迁与江南都市文化品格的塑造

■ 徐宝余

晋室南迁, 也将北方的中原文化传播到了江南, 并与吴越文化融合为新型的江南文化, 从而赋予了江南都市以诸种文化品格, 如礼乐文化、士人精神、山水品格、声色之风等, 而兰亭修楔更是成为江南都市文化的永恒

象征。

【关键词】江南都市; 东晋; 南朝; 兰亭修楔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10-0013-07

徐宝余(1972-), 男, 文学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上海 200234)

本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建设项目(编号: S304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东晋末年, 北方经历了八王之乱以及五胡乱华, 晋王室南迁, 除少量滞留在北方坚持抗战及由于地理阻隔未能南逃的一些家族外, 大部分北方士民纷纷涌入江南。据当代史家统计, 南迁人口达90万, 占当时南方政权人口的六分之一, 占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而且这个统计也只是仅计算出侨郡的人口, 还不包括众多的隐户。^[1](P199-223)]

这些南下的人口, 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门类: 一类是以皇室和世家大族为主体、以经生文士、部曲将帅为依附的上层群体, 可称之为衣冠士族; 一类是作为前者的依附户口以及在战乱年代失去依傍的散户, 他们处于南下人口的下层, 可称之为流民。前一群体是构筑江南都市精神文化的主体; 而后一部分则为江南都市精神文化的构筑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

先来谈后一部分, 流民南下为江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力保障和技术支持。首先, 南下流民为巩固江南政权提供了有力的军事保障。京口是东晋南朝南下流民的一个重要聚居地, 郗鉴正是依靠流民力量得以在京口形成军事防御, 在拱卫京师建康、稳定江左政局、安抚北来流民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 大量农业人口的输入, 除了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带来丰富的劳动力, 从而可以大面积进行垦荒开湖, 而且还带来了北方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和优良的作物种类。现代研究者认为: “六朝时期, 除了麦类向南方大面积推广外, 粟、菽等北方旱作物也随之向南推广。”^[2](P99)]此外, 东晋南朝政府对南下流民实行侨置和土断政策, 使得“君子则有土风之慨, 小人则有下役之虑”(《晋书·范汪附子宁传》), 对江南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土断政策的推行使流民与土著居民形成了一种共生状态, 北方宗族与南